

# 大田县济阳传统村落特色与保护

李华珍

(福建工程学院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在实地调研与文献解析的基础上,再现脉络清晰的济阳古村生成、发展与演变的动态过程,探讨聚落发展的内在动因,剖析在这过程中形成的顺应自然、师法天地又符合村民生计的聚落营造观念,展现多元文化影响下多元共融又自成一体的建筑形态特征,强调宗族观念与地方乡绅在聚落延续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济阳古村不同于其他村落之处,也为济阳古村谋求内生性的自主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 建筑; 价值特色; 保护; 地方乡绅; 济阳; 大田; 福建

**中图分类号:** TU98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6)01-0097-06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yang traditional village in Datian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 and its protection

Li Huazhe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ite survey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vein of the dynamic course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evolvement of Jiyang traditional village is reconstructed.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 is discussed. The settlement building concepts that comply with the nature and conform to the village people's livelihood are analysed. The multi-cultural architectur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ttlement are presen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patriarchal clan concept and the local squire in the sust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 is highlighted along with its hidden cohesive force to the village people. The typical character of Jiyang traditional village is focused, which is why the village can develop for endogeneity in an independent mode.

**Keywords:** architecture; valuable characteristic; protection; local squire; Jiyang; Datian; Fujian

自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来,古村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的乡村数量庞大,加上不同自然环境、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古村落呈现出很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为此,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村落的时候,更要关注各个村落发生、发展的特殊性与历史性,因村制宜,避免模式化、空洞化与一刀切。

济阳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东南部,东临德化县美湖乡,南接永春县下洋镇,北连德化县双汉乡,西临吴山乡,是济阳乡集镇所在地。该村地处山地丘陵地带,平均海拔540~830 m,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地形,年平均气温17℃。村落与山地交织,生态环境优美,历史悠久,风貌完整,现存有明清时期的古建筑40余幢,民国时期的古建筑60余幢。其传统建筑类型丰富,祠堂、

收稿日期: 2016-01-10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联项目(2014B065)

作者简介: 李华珍(1978-),女,福建福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传统聚落与传统建筑。

民居、寨堡、宫庙、廊桥、私塾、古街等一应俱全,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评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第四批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本文拟探讨这一村落延续至今的主要因素、价值特色及其保护与发展途径。

## 1 济阳传统村落特色

### 1.1 脉络清晰、有迹可循的古村落演变

中国传统村落的发展体现出了很强的自发性与随意性,其发展大多未能进入官方的视野,相关的文献记载也比较缺乏,即使有族谱等资料存世,也或散失不全,或语焉不详,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济阳古村难能可贵地保留了完整的《涂氏济阳族谱》,并且在其中详细地记载了村中每座建筑的建造者与大致时间,为我们勾勒出了有迹可循的村落发展历史。

济阳是一个以涂姓为主的血缘村落。据记载,德化派系涂姓第十四世轸九公(济阳第1世),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开基济阳村旧宇堂。开基之始,生计维艰,涂氏人丁不旺。直至明末清初,涂氏在济阳繁衍到第6代,濂头洋中也仅散布着旧宇堂、岱山堂、兴居堂与福兴堂几座民居。“康熙年间,漳寇陈五显在陈吴久困弗克,突来攻我濂头寨。时乡人未兴,只有十余人固守”<sup>①</sup>。可见,当时还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聚落。

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济阳第7~10代左右),涂氏因“善于经家建功置业”“广置良田”,人口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四个房派。长房主要在济阳的上洋发展,三房在下洋繁衍,二房与四房则外迁永春等地。人丁兴旺后,涂氏纷纷开始建宅立业,以长房为例,乌纱堂、瑚山堂、道隆堂等17座民居巍然而起,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建造与完善,聚落逐渐形成并发展完备。

明清时期,大田、德化等地因地瘠民贫,匪祸迭起,为避匪患,涂氏早在明朝就于濂头洋中建起了大墩寨,同原先就有的金鸡寨、陈备湖寨共同组成了外围的防御体系。清朝康熙、乾隆以后济阳经济的发展更引起了盗匪的觊觎,朝廷的控制又鞭长莫及。乾隆年间,涂承康、超文等因此具文呈报德化县正堂,“山居僻壤,鼠窃难防,许人禀明筑造土堡,以保身家。”<sup>①</sup>凤阳堡因此得以建造,成

为聚落重要的避难场所,聚落功能也更加完善。

清朝嘉庆以后至民国时期,是涂氏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济阳地处闽中往闽南的驿路上,那时闽南往闽中、闽北的诸多物资,借由成百上千的人力挑夫,经由这里运送,济阳逐渐形成一条商贸交通老街——济山街。据当地老人们回忆,这条古街两侧货栈林立,各类商铺比比皆是,这些百年老铺现今仍保留了一些。与济山街遥相呼应的还有一条跨越大田、永春、德化三地的爱门街,民国时极为繁华,其商铺也多为涂氏经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涂氏带来了良好的商机,他们不仅善于把握机会“居家发业”,而且出外经营,积累了丰厚的产业。如代廷公,“随父流从浔州富川县廿余载,治产经营,致资财巨万,因祸得福。回家广置田园,治谋久远,子孙昌炽”<sup>①</sup>。清朝嘉庆至光绪年间,仅涂氏长房就建起了69座华屋大厝,民国丙辰(1916年)一年,就建起了11座大厝,即为雄厚经济实力的见证。民国丁巳年(1917年),济阳遭逢兵灾,房屋被焚毁30余座。但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就重建了20来座,颇具实力。

随着济阳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下南洋谋生也逐渐成为当地民众的一大选择。据笔者访谈,济阳涂氏三房仅丰积堂一支繁衍至今有1600多人,其中,在海外的就达400多人。《涂氏族谱·历房屋部》的记载也印证了这点。比如,“萃甲……家贫,往南洋谋生”;“荣敏……经商,广置田园,四度往南洋经商,董修聚星堂、丰积堂、雨亭、岱山堂,复架先觉堂、黄中堂,开基后觉堂及爱文街恒泰店铺。”<sup>①</sup>出洋经商致富后,这些华侨往往选择回乡开基立屋,也给济阳带来了西式的建筑风格,锦云楼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造起来的。

济阳的衰落是从1949年以后开始的。公路改道后,济阳闽中商乡的地位一落千丈,仅成为济阳一乡的经济、政治中心。村中经济以种植水稻、甘薯、大豆、茶叶为主,全村有水田1766亩,茶园2120亩,果园1050亩,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约5千元。经济的凋敝,使得很多人都选择外出谋生,尽管是乡政府所在地,但留在村中的也多为老弱妇孺,济阳也有成为空心村的趋势。

① 济阳涂氏族谱·隗迈派家谱。

## 1.2 因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古村落选址与布局

### 1.2.1 聚落与建筑选址

济阳古村位于大田、德化、永春三县交界之处,地处万山之中,东有礼佛岐,西有白洋岐,南有大鹏峰,北有后林峰,四山拱照,中有良田,济溪蜿蜒其间,是典型的高山云窟。这种地形既有安全保障,又无温饱之虞,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是极为理想的栖息之所。涂氏先人即看中了这一得天独厚的山水环境而迁居于此,并在此基础上寻砂、觅龙、察穴。据《涂氏济阳族谱》记载,济阳龙脉自大谷山起,过金鸡岐,转过大岭峡,另分一脉为椽枫仑,直抵新坵仑,以为水尾关锁之山。正脉则穿石狮格,穿田耸起巨峰,前后拥护,突起开三台屏,岱山祠堂正位于其“穴”,负丙揖壬。转起水滴坑尖,以为祠堂之乐山;又再过石塔格,耸起作岱山寨,为土星御屏。转过大垅头格,格外陈坑尖扶挟有力,从大垅头尖正中踊跃至礼佛岐,迢迢顺格,脱落至大垅坪格坵,其左大鹏峰,其右后林峰,相互依托。再抽出脉,奔腾至后格垅,即耸起石竹仑,成一大金星,正结旧宇宗祠,坐壬向丙。再脱出金角作桥头仑,对抵新坵仑,作紫云桥关锁水口。山为地脉,水为关口,水口关系一村财富运道、吉凶祸福与文运科甲。济阳水口的落差较大,去水急且凶,不利聚财守气,轸九公在营建旧宇堂的同时即建造紫云桥,种植风水林,以便关锁水口,同时在桥下水中设石龟逆水而上,缓解水流的速度,以成形胜。



图1 济阳古地图

Fig.1 The map of ancient Jiyang village

济阳四面环山,良田居中,为尽可能不占用耕地,建筑一般选择在山麓缓坡上或山脚或两山丘环抱之间而建,且多朝向家族田地而建,甚至形成围合关系,这样既能保证农耕生活最重要的资

源——肥沃的土地,形成前低后高、背山面田的有利格局,又与周围山林农田融为一体,生机勃勃,表现出了很强的靠山性,深合中国古代提倡的“因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旧宇堂是涂氏奠基济阳之所,其选址“四山拱照,四水朝堂”,涂轸九公希望借此“启后人簪缨”。其子涂元八公则在此基础上锦上添花,以龙脉正脉(三台屏)为靠,水滴坑尖为护,岱山寨为屏,良田为明堂,建造了岱山堂,而为了确保子孙既能添丁、添才,又能添贵,在风水术士的指引下刻意将大堂、天井与半月塘朝向三个不同的方向,用心良苦。锦云楼,建于山岗余脉处,背靠稳固,左右山体如太师扶手,建筑前面为平缓开阔水田,水田之中有小溪流环绕,远处为条形案山。这些建筑的选址正符合《阳宅十书·论宅外形》所论“前有高埠后有冈,东来流水西道长,子孙世世居官位,紫袍金带拜君王”。

当然,济阳先民在择居时,并不都能找到理想的地形,此时往往就要做一些风水补救。如岱乾堂,对面案山风水认为不利生气,故在院前修围墙,两端起翘,以便压胜。三多堂建在田中,四周无靠,阴气较重,故将后楼特意抬高,并做成半圆形,对主座形成围护,补救地形之不足。

涂氏先人既依赖自然环境,又借助传统的“风水术”,完成了对自然的趋吉避凶的选择,营造了宜人宜居的环境,也很好地印证了古人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

### 1.2.2 聚落布局

由于民居因借自然形成的各个分散的小山丘分布,山丘之间又夹杂着农田,使得济阳整体聚落呈现出一种散村的状态,并没有形成传统社会中常见的集村形态。以山为靠护、以农田为明堂的民居,形成了山-宅-田交错交融的和谐景观。这样,聚落中同一走势的山麓下分布的民居形成了带状布局,不同走势的山麓下的民居之间则保留了较大的空间距离,民居间的联系若即若离,看似就在对面,走起来往往要穿林越田,形成了典型的“住宅围田”的组团布局。

这种散村式的聚落布局看似表面混乱,实则有一定的秩序感。聚落空间组织随着盆地内部地形的不同而变化,建筑朝向也随地形而改变,并没有形成一般亚热带地区坐北向南的格局。村中的民居也随地形的变化而被分为上洋与下洋两个区

域,但两个区域没有明显的界限,犬牙交错在一起。在上洋区域,以建于独立山冈上的墩仔寨为中心,民居建筑大都围绕其沿地形变化,呈分散式向外延伸布局;在下洋区域,以建于水田当中的凤阳堡为中心,民居建筑环绕凤阳堡呈分散式布局。聚落布局体现出了很强的防御性(见图2、3)。



图2 济阳村下洋区域图

Fig.2 The map of Xiayang district at Jiyang vill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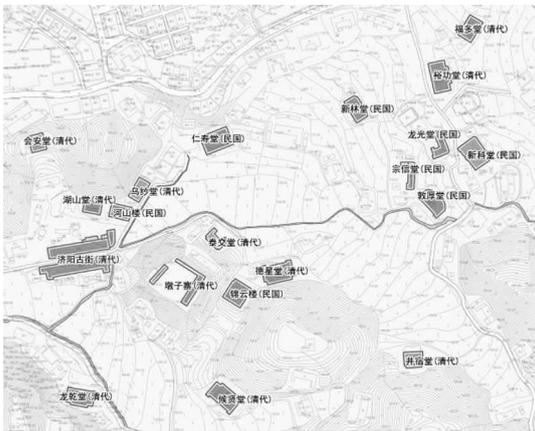


图3 济阳村上洋区域图<sup>①</sup>

Fig.3 The map of Shangyang district at Jiyang village

济阳聚落的布局也体现出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建筑的影响。清朝嘉庆以前,大部分的居民都以“力田”为生,田地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对土地的依赖性比较大,故民居大都沿山而建<sup>②</sup>,不破坏耕地。清朝同治以后,尤其是民国以后,大量的济阳人走出了大山的包围出外谋生,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了。他们衣锦还乡后,建宅立业,考虑的首要问题就不再是土地问题,因而一些民居

开始建在了良田之中,三多堂、新科堂、敦厚堂、新林堂等一批清末民国时期建造的房屋即属于此列。它们布局相对集中,交通比较便捷,生活更加便利,形成了有别于早期布局形式的组团。

建国后,随着公路的开辟济阳聚落的发展方向出现了根本的变化。过境乡道穿过下洋区域,但对原有民居布局的破坏不大。在上洋区域,乡道避开了原有的聚落,在其北面的后格垄山丘上通过。古村风貌因而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其后的新民居与公共设施基本沿过境乡道两侧布置,自然形成了保留古村,发展新村的格局。

济阳人在长期择居的实践中,对自然、生产、防御、生活等各方面的因素进行了现实的考量。早期,人们对于自然的依赖性比较大,在聚落布局中体现了较强的顺势而居、因应自然的倾向。清末民国以后,随着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聚落布局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社会文化的影响与作用逐渐加强。

### 1.3 多元共融、自成一格的古村落建筑形态

济阳地处三县交界之处,在古代是闽西北与闽南乃至海外的商贸交通中心,明清时期隶属泉州府管辖,中华民国后隶属三明地区大田县。该村语言及风俗习惯同质于泉州,又受到闽中山林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大批民众下南洋谋生。这些都给济阳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影响,其建筑也表现出了多元共融的特点。

从建筑类型看,除了大量的传统民居,济阳还有如凤阳堡、墩仔寨等壁垒森严的寨堡式防御建筑,如阳中堂似的宅堡结合得建筑,又有带有南洋建筑风格的“洋楼”与“骑楼”建筑。风格多元,又互相交融,相得益彰。

从平面布局看,济阳民居类似闽南官式大厝“五(七)间张加双边护”的平面布局形式,不同之处在于,济阳民居平面处理更加灵活自由,与山地结合得比较密切,层层跌落,空间变化丰富。建筑因山而建,进深不大,多以一、二进为主,高度上也逐渐由单层发展成二层或带夹层的大空间,与闽中、闽东一带的楼居相仿。济阳民居还有一个特色,即在民居的后部一般都要设三层花台宿土,呈椭圆弧形,线条为流水曲线。这样的处理方式与

① 图纸由福建工大设计院洪英灿、沈慧芬绘制。

② 凤阳堡除外,出于防御考虑,凤阳堡建在田中空旷之处,保证土匪没有突破口。

客家围龙屋的“化胎”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家族繁衍,化育万物的意思(见图4)。从建筑形象看,与闽南大厝相似,济阳民居主座的屋顶通常分成3~5段,中间三间屋顶突起,两侧跌落。祠堂或宫庙的屋顶正脊处理成高高翘起的燕尾脊,但普通民居的屋顶正脊不做燕尾脊,而是由中间向两边缓慢升起,曲线较为挺直而显得厚重。济阳民居多用悬山顶,山墙两侧多加披檐,下覆尽间或廊道;两侧的护厝屋顶层层跌落,与主座屋顶结合,有凤凰展翅之意象。这点又与闽中民居屋顶的处理如出一辙。



图4 道隆堂

Fig. 4 Taolong hall

从建筑材料与构造来看,闽南建筑常用“红砖白石”与红瓦,建筑色彩鲜艳、张扬。济阳民居则多用木材、粉墙(夯土刷白)、灰板壁与小青瓦,色彩清新淡雅,内敛。济阳民居一般采用穿斗式或穿斗、抬梁穿插式构架,其瓜柱、吊桶、束肥、鸡舌等部位的做法均与闽南民居相似。不同的是,其木构做法注重表现材料质感,手法简洁、朴实、得体,体现了山区建筑朴素、实用的特色。

#### 1.4 敬宗睦族、造福乡梓的乡绅文化绵延至今

济阳是典型的血缘村落,敬宗睦族的观念依然在乡间盛行。涂氏十分注重通过建祠堂、修谱牒的方式增强村落凝聚力与村落文化内聚性。济阳现有涂氏总祠——豫章堂、分祠——旧宇堂、支祠——岱山堂等,村民在此祭祀涂氏先祖,并商议解决族中大事。济阳涂氏还热衷于编修族谱,其族谱大修过3次,分别为:清光绪年间、民国二十五年与公元1997年,现存完整,并能与济阳实丰的涂氏族谱相互印证,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通过查阅族谱与访谈,我们发现,涂氏将“肯构堂以成大厦”作为人们建功立业的标准,将建宅作为人生最重要的功业慎重地载入族谱之

中,并以朱砂大字加以强调突出。在济阳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说法,后人一直居住在老屋中被称为“没本事”,后亡人的牌位不得供奉在先前建造的老屋之中,这就逼得济阳每代人都要建屋。虽建新屋,但因旧屋承载着祖先的功德,济阳人也并不废弃老宅,反而想方设法地进行维修保留。很多老宅后来都逐渐发展成为涂氏各房支的房厅(或称香火厝),以供奉各支派的祖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济阳为何可以保留数量如此之众的古厝。这种传统还一直延续至今,哪怕是已经建起了钢筋混凝土的多层建筑,还不忘在屋顶上加盖一层仿木构的厅堂,以供奉先人牌位,有香火延续之意,寄托了对先人的哀思。

济阳古村风貌能够得以延续至今,地方乡绅的作用不容小觑。涂氏先民深受“耕读传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十分注重教育。在构架华屋的同时往往并筑书轩(或书斋),井宿堂、金龙堂、道隆堂、丰积堂、钟秀堂等十几座民居均建有书楼,以便延师课子,教育族中子弟,这在族谱中多有记载。但涂氏的仕途走得并不顺利,纵览涂氏族谱,济阳涂氏通过科举入第的寥寥无几。“自山寨始祖开创经营弗暇事举子业矣,”至第4世历二公方为耆宾,第8世超茂被引为乡宾。嘉庆后,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捐上了监生、贡生、增生、附生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关系被引为乡宾或耆宾,还有一部分则通过习武或军功以获取功名。通过这些方式,地方乡绅获得了参与地方事务的话语权。

“从明中叶至清后期,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日趋萎缩,社会控制权不断下移”<sup>[1]</sup>。济阳偏安一隅,国家政权更是力有未逮,因而这些乡绅在地方公共事务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建筑而言,他们不但独股或合股建造住宅,而且“凡庵堂祖宇、道路桥梁以及县署考棚,靡不董建”。如,监生远魁公,勤俭治家,广置良田,除建德星堂与仁寿堂之外,还董建紫云桥与乡中道路,立膏火数千亩租田,栽培子孙经文纬武。为加强乡族的凝聚力,这些地方乡绅一直十分重视维修或重建祖堂。清朝同治年间,涂氏德字辈的乡绅就为首倡议重建了仁寿堂、井宿堂;董修了岱山堂、乌纱堂、瑚山堂、新坵堂、道隆堂、兴居堂、井宿堂、凤阳楼祖宇等。光绪年间又董建新坵堂,董修了乌纱堂、瑚山堂、道隆堂、凤阳楼、井宿堂、莲花庵等。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前

所未有的大变局。商人取代士绅而成为地方社会的领导阶层”，济阳亦然。诚如上文所述，济阳到民国时期，商业成为重要的经济基础，商人成为担负地方社会责任的领衔者。民国年间能建起三十几座民宅，丁巳年遭逢兵灾后，能够在几年内迅速重建起大部分的老宅，商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涂氏族谱多有记载，比如，程华“有陶朱之计……董建钟秀堂、侯贤堂。民国壬申开基河山楼”，并倡建济阳古街等。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由地方精英出面牵头重建或重修老宅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在调研与访谈中发现，济阳现存的老宅很多均已修复或正在修复，保存状况较好，基本上都是通过各房支有威信的人出面牵头成立理事会，而后通过按人丁摊派的方式筹集资金进行修复的。当然，其间有能者多出资，经济状况稍差者多出力，互相协调成事。一些保存状况欠佳的老宅，多是一些无人出面牵头或经济状况不好的房支。

可见，在传统宗法观念与乡土意识的影响下，乡绅是济阳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物主要由绅士出面组织，也维系了村落传统文化，延续了村落历史风貌。

## 2 济阳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思考

民国以前，济阳传统村落在封闭与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中一直沿着自身农业经济的轨迹循规蹈矩地发展，环境与土地的制约性表现得比较突出。清末民国后，随着人们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在弱化，商品经济的影响逐渐强化。但无论如何发展与变化，崇宗敬祖、建功立业的理念深入到济阳人的血液当中，今天亦然如此。这种观念被物化到了传统建筑之中，得到了实质化的体现与延续，其间地方乡绅的作用不容小觑。如今，乡绅在济阳乡土社会中看似缺失或者断层了，但实际上还是隐性存在的，济阳现存的大量传统民居都是由他们推动维修的。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比如教师、政府官员、企业家等退休返乡后，致力于村落传统文化的宣传、保护，同时也通过身体

力行修复祖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河山楼就是由一对退休的老夫妻回乡后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的，不仅成为他们养老的好去处，也成为当地村民聚集聊天的场所，为传统民居的再利用提供了好范本。济阳还有大量散居在外的华侨与村民眼中的“能人”，他们大多有反哺乡梓之心，却没有找到好的途径。因此，政府适当引导，重构济阳新乡绅阶层在济阳也能事半功倍。

就中国农村而言，乡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维系力量，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受教者与传播者；而新乡绅除此之外，也是新知识的倡导者与传播者，他们善于学习，也善于抓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扶持的机会，加强传统村落的产业转型。重构这一阶层，通过正确的舆论宣传，积极创造条件让村民参与到聚落保护中，恢复或加强村民的文化记忆，有利于改变因城镇化浪潮所带来的村民文化自卑与文化自毁意识，从而增强村民的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认同度，为传统聚落的“活态”保护与发展找到内生的动力。这种内生性的自下而上的自主保护模式，尊重乡民的主体性，有助于接触到村落保护的本质，体现村民真正的利益诉求。这样的保护与发展才是乡村性的，也才能真正地留住乡愁，留住文化。

## 3 结语

与中国其他村落相比，济阳传统村落既有均质特征，也有独特之处，构成其价值特色。其间，“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物主要由绅士出面组织，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乡村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sup>[1]</sup>正是这种“乡村绅治”与宗族意识延续了济阳村落的传统形态，并使其保有活力。随着国民整体乡土意识和文化发掘的自觉，在推广农业生态理念，发展有机农业，农村信息化，资本下乡，大学生回乡创业等契机下，知识信息以及知识分子逐渐向农村集聚，济阳新乡绅（或称新地方精英）的形成也成为可能，而这也给济阳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内生性发展的机遇。

## 参考文献：

- [1] 郑振满. 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2,316.
- [2] 吴理财. 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J]. 天津社会科学,1999(4):75.